## 一次左派青年的打工经历

作者：普通人

2021年1月14日，我乘坐动车前往上海打工。满怀期待地望着车窗外的景色。青年学生不应只局限于单纯的理论学习，属于无产阶级的马列毛理论需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所以，学习马列毛理论起码得知道工人劳动的状况。本着这样的目的，我想在打工中与工人有一个密切的交流。然而，之后的经历告诉我，寒暑假工的劳动形式是不靠谱的，不能与对工人阶级之间产生密切联系的。

我们学生一般都是通过微信朋友圈了解到招工信息的。而打工的“老手”往往直接通过劳务中介得到工作信息。求职者一般与线上或线下两种劳务中介最先接触，这些劳务中介被统称为介绍人。线上的介绍人一般活跃于微信朋友圈，他们发布的招工信息中工资都十分诱人，但实际上都是避重就轻、真话里掺假话的。线下的介绍人一般是有门店的，像房产中介一样。他们构成了剥削学生的第一层。原则上学生有自己选择劳务公司的权力，但线上的介绍人直接给我选定了一家与他们有合作的劳务公司。之后，我便去介绍人给的接待宾馆处的报道。

我在接待的宾馆处接触到了劳务公司的人，并且得到了去工厂报道的地址和时间。报道当天，我在工作地点附近集合。劳务公司的人会让我下载特定的app并买下厂服。一件单薄的带有荧光条的背心，他们会收我30元。然后，他们把工人分为社会工和学生工。在我看来，两者的区别只是学生工离职所需提前的时间比社会工短而已，比如说学生工需要提前3天提交离职单，而社会工需要提前一个月。关于这两种分类其各自的优缺点，大家都是不知道的。劳资之间、劳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差，除了从介绍人那里得知的工价，我们对任何信息都一无所知。不过，劳务公司虽然明面上占有着你的剩余价值，但他们也会提供所谓周到的服务，你有什么难题，他们也会帮你解决，以此表明他们那一方面存在的价值。

学生工一般不知道他们所选择的工作地点是做什么的，不知道是否可以预支工资（尽管介绍人会说，但实际却不是那样），不知道发工资的正确的时间。这些信息差是介绍人的隐瞒以及劳务外包这种劳动关系下的必然。工人会与接受劳务派遣的公司签订一份“保密协议”，这份协议规定了个人间不能交换工价信息。我们在开始工作以后才得以知道公司真正的安排。

学生工与劳务公司间签的劳务合同有许多猫腻。短期工的劳务合同分劳务派遣和劳务承揽两种。中介人通常给我的是劳务承揽合同。这两种合同在与劳工从事工作时，劳动者管理的责任主体、计酬方式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区别。首先，就责任主体方面，劳务派遣公司的劳务工必须按照企业确定的工作组织形式和工作时间安排进行劳动。劳务承揽合同的员工其工作组织形式和工作时间安排由劳务承包单位自己安排确定，显然，劳务承揽更“自由”，更适合这些简单而重复的工作的。如果合同上显示的是劳务承揽，那就说明每天的工作时长不确定，的具体岗位也不是确定的，这也意味着什么？既然工作时长由工作单位定，那就不存在什么加班和加班费一说了。其次，就计酬方式，劳务派遣是按工资福利计算，劳务承揽是按委托项目的价值计算。在劳务承揽的关系下，劳动者成为了公司可以随意支配的机器，要一刻不停地干活，即使可怜的时薪也许只有20元，但后来我了解到，甚至有些人的时薪连20都没有。以我经历的为例，某个鞋类鉴别平台要求它的员工一小时至少鉴别45双鞋子，一天达到500多双鞋子才可以下班，达到600双鞋子可以提前下班。尽管我们每天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但是我们的工资却不能按时拿到，当月工资会拖到下一个月再发，这已经成为大家认同的市场潜规则了。

如果有左派青年以去工厂里打工作为自己与工人产生互动的方式，我会用自己的经历来劝阻你们。第一，工厂里的工作是单一重复又繁重的，你会感到身体和精神的疲惫，而且你也没有充足的学习的时间，但是，工厂会教会你什么是异化。第二，像是招短期工的工厂，一般多以学生居多。而学生多是来打短工的，并不以这个为生。所以，无论是打工赚钱还是了解工人，自己亲身进厂始终是下策。

虽然在这次经历中我的收获并不是很大，但是也认识了一些工友。工友们大多是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学生，他们都有各自出来打工的理由。

我身边的学生工友按家庭条件来看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其中一类人来自较为富裕的小资家庭，我在这些一起劳动的学生身上见到了各种各样昂贵的鞋子，也丰富了对发型种类的认识。他们并不缺钱，只是来体验生活或是赚钱买消费品的。这些 “工人”中存在着不少沾染流氓无产者习气的人，他们对周围的人具有攻击性，而且不会尊重别人。你可以轻易地看到，在等班车的时候，他们会自主地形成一个个小团体。这类人最容易成为资产阶级法权下的工贼和鲁迅笔下的乏走狗。沾有流氓无产者习气的小资学生往往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屁股坐在了资产阶级的那一边。在我提交离职单的时候，我岗位的领导问我：“你不看新闻的吗，锅勿愿通知，离开上海的必须持有核酸证明才可以，不管你是以什么形式离开。”我愣住了，在思考这个所谓“政策”的合理性的时候，边上一个我不认识的“小资”工友用一种谄媚的语气说道；“兄弟，留下吧，留着赚钱，激励金这么多，票子和马子在等你啊”。我没有搭理他，而是签完单子以后打电话咨询铁道部门，他们说并没有这种规定。到了离职前的那个晚上，我们排队打卡下班，这时那个人过来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是明天就走，他居然说道；“我看你怎么走”。资产阶级利用疫情防控的外壳包藏着希望工人一直为他们工作的事实，并且以获取条件极其复杂的激励金制度欺骗劳动者为他们全勤工作，牺牲他们享受春节假期的宝贵机会。显然，那位劝我不要离开的同学显然是不由自主地把屁股坐歪了。

但是更多的学生工友因为经济原因出来打工的，在干活的时候也更为卖力一些。他们大多数有过打工的经历的，而且有各自的难处的。我的其中一个工友，在通过我了解到墨茶的故事的时，问我，你这么替墨茶难过有意义吗。“这种人很多，你也无法替所有人难过，就像我，我父母去世了，就和我奶奶生活”，他看着我说到，“你信吗”。我点了点头，默不作声。后来，一次不经意间的聊天使我加深了对他的了解——我脚上400元的万斯休闲鞋甚至抵得上他一个星期的生活费。

在这次经历中，我与真正的工人也有了一定的接触。在我首次入住到工厂承包的宾馆之后，我被我的居住环境给震撼到了：门口的垃圾桶上方是金字塔状的垃圾堆积起来，周围散落一地的各自垃圾，散发着腐臭味，而一间不到20平的房间里摆着三张上下铺的木床，地上覆盖着由烟头和脚印组成的“地毯”，空气里的刺鼻的气味不断刺激着我的呼吸道。这是他们的生活环境。那天晚上9点，他们陆陆续续地回来了，带着泡面、瓜子和白酒。之后的几天，他们或许是通过视频和远方的朋友喝酒聊天，或许是开着扬声器看电影一直到晚上11点半。总之，他们的作息十分地不规律，接近凌晨12点睡是经常的事。我发现他们口中比较多的是喝酒，为了更好入睡而喝酒。他们来自不同地区，通过中介的信息跑到各地打工，也不是长期从事一份工作。在我的工位边上，是塑封的岗位。有一次，我听见了几位塑封的大叔在讨论一个“流氓小资”与他们的矛盾，大致事情不过是一个“流氓小资”和他们其中一个大叔产生了矛盾，那个“流氓小资”甚至说要叫人打那个大叔。“我们是出来赚钱的，和这些小屁孩计较什么”，一个光头大叔说着，眼眶通红的一圈表达着他的无奈。他们都是我所希望见到的工人，是在市场经济下的一颗颗“螺丝钉”，他们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从事着极其简单的分工，年纪大了之后，被年轻的劳动力替代，资产阶级法权下的不平等的地位让他们请楚地意识到“被叼如喝水”。

仅仅是996的工作制度下的人，在经历一天的劳累，是很难有心情拿起书本的，而身体上缓解疲劳的方法就是喝酒，精神上缓解疲劳的方法就是抖音那些“精神鸦片”。在返程的火车上，我明白了，对于他们的境况，鄙陋之人会露出嫌弃的神情，自以为是地说道，不好好读书就是这样子的，不努力就是这种结果，而作为学习马列毛思想的我们，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能在批判上述鄙陋之人的同时，面对劳动人民缺表现地像粗鄙之人，同时将理论束之高阁，理论学习脱离群众。我们的学习是为了改变他们的境况，是为了劳动人民的未来。